



揭秘 亲历者

1945年10月中旬,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二楼正中会客室,苏联红军驻大连警备司令高兹洛夫中将热情地接待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此人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刚任命的大连市委书记韩光(1912年-2008年)。

一周前,为解决向东北进军的华东解放区部队多艘木帆船在大连沿海被苏军扣留的问题,韩光奉命到大连会见高兹洛夫将军,妥善解决了问题。韩光曾于1936年-1938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两年多时间,能用俄语直接同苏联人交谈。他敏锐的政治见解和优雅的言谈举止,使高兹洛夫将军一见如故,主动同他探讨起建立中共大连市委的问题。韩光回到沈阳后,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作了汇报。东北局当即决定,任命韩光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赴大连筹建市委。

在大连工作8年多时间,韩光对大连特殊解放区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所在地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

生平简介

韩光,原名孟宪林,1912年3月24日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30年加入共青团,任团满洲省委秘书长。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兼任团北满特委书记。1933年起任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42年起主持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1945年10月起,历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中共旅大地委书记、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中共旅大地委第一副书记、中共旅大市委第一副书记、旅大市政府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等职。1953年调离大连后,历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副省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2008年9月27日病逝于北京。



1947年,韩光(右)与大连市副市长陈云涛在一起。



1947年,韩光(右)与苏联红军驻大连民政局负责人巴什上校研究特殊解放区工作。



1947年,韩光与夫人黄力、长子欧亮在大连海滨合影。



1948年,韩光在大连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讲话。



1985年,韩光(左)在大连会见沈涛时回顾起当年的工人训练班。

韩光著《征途漫漫》(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韩光与大连特殊解放区

刘功成

实际执政 “抢形势”“搭架子”

韩光二次抵连后,积极贯彻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抓住时机,抢形势,搭架子,尽快把大连市党、政、警、群领导机关建立起来,掌握大连政权。”他首先组建中共大连市委。开始时,人员不足,他便以大连市“工委”的名义开展工作,1945年11月正式成立中共大连市委。他力排众议,不赞成中共大连市委挂牌公开活动的主张。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他的决策。后来事情发展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党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使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有更大的回旋余地”。(韩光,《征途漫漫》,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为完成东北局关于在大连“抢形势”“搭架子”,建立民主政权的指示,韩光于1945年10月下旬,同大连总工会委员长唐韵超研究决定,由工会出面,采取办工人训练班的办法,培

养一批干部,发展一批党员,把他们派到党、政领导岗位上。韩光和沈涛等东北局派到大连的干部登台讲课。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大连工人训练班连续办了5期,共培养820名工人,从中发展300多名党员。结业后,他们有的被派回原单位担任党或工会干部,有的被分配到大连市政府、公安局、法院、中苏友协、妇联等党政群团部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大连建立政权的骨干力量。

韩光把掌握警察队伍作为中国共产党掌握枪杆子建立和巩固大连民主政权的手段。1945年10月23日,在他的工作下,原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杰成为大连警察总局局长(为不暴露原来身份,赵杰改名赵东斌)。11月7日,大连警察总局成立(11月25日,改称大连公安总局)。对外赵东斌是

总局局长,韩光为总局训练处主任;对内按我军领导机构设置,赵东斌任司令员,韩光任政委。

在筹建市委的同时,韩光“即与苏军当局磋商成立市政府的事宜”。(《征途漫漫》)经过大量工作,11月8日,大连市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在市政府前广场召开,中共大连市委派出的副市长陈云海宣誓就职,市委安排的市政府秘书长和公安局、教育局等几个局的局长或副局长,也随即走上领导岗位。

1945年底,中共领导下的旅大党政群机关,市、区县的“架子”已经全部搭起来。当时的大连市政府、旅顺市政府、金县政府上面没有地政府,分别归中共大连市委建立的各市委、县委领导,从而实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的先机控制大连战略要地的意图。

中苏关系 “以苏为主”就是“以我为主”

苏军驻防和对大连实行全方位军事管制,这是抗战胜利后“旅大政治环境中最突出的特点。”(1949年5月20日《中共旅大区党委关于三年来中苏关系的总结报告》)为搞好同苏联驻军当局的关系,韩光提出并积极推行“以苏为主”就是“以我为主”的工作方针。1945年-1948年,旅大地区的防务和外交,货币与银行的管理,港务、海关、电力、自来水等企业的管理,都是苏军当局直接承担的,由于彼此在大局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以苏为主”实际上就是“以我为主”。

韩光结合大连实际的精辟分析,使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对大连解放区的特殊性有了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在减租减息、反奸清算等一系列工作中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方法,对共产党在其他解放区实行的政策采取变通形式,采纳苏军当局的意见,充分发挥司法、

检察机关的作用,卓有成效。

在处理同苏军当局的关系上,韩光代表中共大连市委与苏联驻军当局高层始终保持密切联系,使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政策和工作得以顺利实施。1945年11月17日,大连公安总局逮捕了混进大广场警察局当上局长、血债累累的潘澄宇。苏军保安部门负责人得知后,把公安总局局长赵东斌找去,训斥道:“你不同苏军打招呼就随便抓这个局长,我就把你抓起来!”这时韩光挺身而出,以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的名义向苏军保安部门负责人提出抗议,以后再未发生类似事件。

韩光在坚持“以苏为主”的处理中苏关系方针的同时,对于苏军中存在着的以占领者自居的思想表现,不是一味迁就,而是以同志式的态度和适当的方法提出意见。

除日常遇到具体问题如此处理外,1948年3月15日,韩光以中共旅大地委名义,向苏联驻军最高负责人别洛包罗夫上将递交长达6000字的意见书,题为《关于联共与中共同志在完成巩固苏联海军事基地共同任务中的工作关系问题几点意见》。对苏军当局派驻地、县(区)代表时常常无巨细地过问当地各方面工作,甚至直接出面干涉、发命令,对我方干部指手画脚加以斥责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提出批评。苏军当局对《意见》很重视,派大连市民政局负责人巴什上校约见韩光和地委组织部长苏杰、宣传部长袁牧华,恳切地进行自我批评,并提出今后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协调双方工作。此后,双方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征途漫漫》)

经济生活 发展生产 安定民生

1946年11月26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金县石河驿苏联红军驻地关卡以北地区,对大连实行海陆封锁。大连实际上成为一个孤岛。粮源中断,市内3.5万人经常处于饥饿状态。

面对民生疾苦,韩光心急如焚。他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中提出“发展生产,安定民生,节衣缩食,投向生产”的工作方针。

他带领大批党政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到农村和生产第一线,组织生产和帮助群众开展生活自救活动;学习前线战士“寸土必争”的精神,把市内一切可以开垦的土地都种上粮食,把运动场和人行道也变成粮田和菜田。大连火车站前广场、政府机关的房前屋后、院墙内外,甚至马路边,都种上庄稼。

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仅大连市区就开垦耕地10600多亩,生产蔬菜250万斤,粮食150多万斤,对解决市民吃饭问题起到重大作用。1948年,金县、旅顺和大连市郊的粮食产量达20.8万吨,解决了全区粮食年需求量的80%,安定了民生。

与此同时,韩光领导地委把失业工人和家庭妇女广泛组织起来,通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投入到生产。包括赶海、摊煎饼、做鞋、织渔网、挖炉灰、拣煤核、挑大粪等等。“为解决吃饭问题开创了一条出路。”(《征途漫漫》)

在日本统治下,大连工业解放前完全走上军事工业的轨道,解放后工厂悉数停产,到处聚集着失业人群。为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韩

光多次出面和苏军当局交涉,接管了大连化工厂、大连钢厂、大连纺织厂、金州纺织厂以及几个机械厂(《征途漫漫》);组建了中苏合营远东电业公司、中苏合营石油公司、中苏合营盐业公司、中苏合营大连造船厂。韩光任中苏合营大连造船厂董事长,其他3个公司也都由我方任董事长、苏方任总经理。这4个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开工,解决了大连2/3工人的就业问题。与此同时,韩光领导组建了“关东实业公司”“大连水产公司”等市政府主管厅局经营的公营企业;帮助一些私营工业恢复和发展生产。

工农业生产恢复了,地方经济搞活了,工人的生活得到保障,国民党军队对大连的经济封锁被粉碎。

支援前线 把大连建成我军隐蔽的后方基地

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后,韩光把支援人民解放前线作为大连特殊解放区的头等大事,充分发挥大连工业基础较强的优势,大力发展军工、军需生产,集中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把大连建成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和稳定的后方基地。

1946年11月,韩光根据形势发展,召集各解放区驻大连的负责同志议定成立中共旅大地委“十月会议”上,韩光提出“巩固旅大战略要地,建设我党隐蔽后方,发展生产,安定民生,支援前线”的战略总方针。

韩光与苏联驻军当局协调,接管了一批苏军代管的企业,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

一个现代化大型兵工联合企业——建新公司。1948年,韩光兼任中共旅大地委军工业生产委员会书记。同年6月12日、13日、17日,3次召集军工业生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1948年军工业生产计划;研究解决计划执行中的资金调度、机器设备、重要原料、工人补充、工资标准与制度、工会与党的工作等问题,有力地保证了建新公司军工业生产任务的完成。

在大连建立我军隐蔽后方基地过程中,为了“不使苏联方面”在应付美、蒋方面造成外交上的被动,韩光提出“只做不说的办法”(韩光,《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传统——为〈大连建新公司兵工生产史料〉集而作(代序)》);还提出有计划地支援、合理地支援、主动地支

援,前线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的脚踏实地支援人民解放前线的策略。在韩光和中共旅大地委的领导下,大连不仅向前线支援了大批军需物资,还支援了大批兵员。据不完全统计,到辽沈战役结束之前,大连地区调出参加东北人民解放军(早期称民主联军)的兵员达3万余人。

在大连特殊解放区期间,韩光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坚持党的建设和教育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和培养选拔干部;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创建多所院校,为大连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打下良好基础;组织开展群众文化工作和文艺宣传教育,在大连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史册上写下光荣的一页。

亲人记忆中的韩光:他对大连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本报记者周代红

不愿意多谈自己的“六爷”

1912年3月24日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韩光,1927年考上哈尔滨第一中学,16岁时就加入青年反帝大同盟。1930年,韩光开始在哈尔滨学院学习,并走上了革命道路。韩光在哈尔滨读书时,正是孟繁林做木匠的爷爷——韩光的五哥资助的。由于韩光排行老六,孟繁林称呼韩光“六爷”。

曾任海军大连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教师的孟繁林,对与韩光有关的抗联史与党史有着亲情与事业双重意义上的关注研究。1981年“十一”,去北京韩光家中看望“六爷”的孟繁林,再次问起相关话题,然而,韩光还是不

太愿意多谈自己。“我们是研究历史,写党史,不是写个人奋斗史……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不吹嘘,不贬低。严防以任何方式、做法,宣传自己、抬高自己。”这是韩光对党史研究的态度。

韩光原名孟宪林,因为长期从事敌占区地下工作,用过很多化名,除韩光外,还有寒光、孟克、晓梦、小孟等,在1934年7月10日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代表李兆麟与团特派员韩光写给党团县委和党团省委的一份工作报告中,韩光还曾有“m同志”的代称,而“张××”则是李兆麟。

“山河欲裂征马鸣”的抗联记忆

“抗联从此,子孙不断头。”1985年7月,73岁的韩光在吉林省安图县密林深处,看到50年前抗联部队行军过天池温泉路上,在一棵大树树干上刻下的豪言壮语时,心情难以平静。

半个世纪前的1933年,正是21岁的韩光抗联之路开始的时候。韩光任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军做政治工作,代理第一军政治部主任,转战在南满和北满的广大地区,协助杨靖宇、赵尚志等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同日伪军进行武装斗争。

在东北人民革命第一军的半年多时间里,韩光协助杨靖宇展开对各路抗日义勇军、

山林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统战局面逐渐打开。“后来,当我们回顾南满初期斗争时,有的同志曾用这样的诗句来概括:山河欲裂征马鸣!”韩光在1961年5月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1934年5月,韩光来到黑龙江省珠河县(今黑龙江省尚志市),将南满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经验带到北满,协助赵尚志和珠河县委进行统战工作,把诸多小股抗日队伍进行改编,组成一支统一指挥的队伍。最终以珠河反日游击队为核心,由20多支大小反日部队编成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

重视史料的有心人

韩光赠予孟繁林的一部约40万字的《韩光党史工作文集》,记录了从上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韩光回忆或撰写的文章及报告等,其中很多是与抗联相关的。更为难得的是,书中还收入了8篇韩光在上世纪30年代的革命活动中,向中共满洲省委及其他地方组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作的报告及函件。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种种战乱与运动,辗转吉林、黑龙江、莫斯科、新疆、延安、大连等地,乃至经历与赵尚志率队进攻五常堡时帽子被子弹打落在地差点中弹的惊险一刻,韩光仍将这些材料保存下来,“有心人”三个字已无法涵盖韩光对历史资料的看重。

从1982年起,韩光兼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东北组组长,开始致力于对中共党史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史及东北地方党史的

史料征集和研究工作。1987年中共“十三大”期间,韩光主动申请完全退出一、二线,之后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抗联史与党史研究上。韩光曾组织编纂了《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组织的活动概述(1919.5-1945.10)》。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东北组组长陆毅曾在文章中回忆,早在1995年7月,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韩光就与几位老同志一起倡议,拍一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领导东北抗联及城乡人民长期坚持英勇斗争的史诗性影视剧。

韩光常要接待很多来访者,“每访,就得谈、写、修改记录,有时还得帮助查阅别人的访问记录。”陆毅记得,“东北党史界的一些同志,也同他形成了亦师亦友般的关系,大家都很敬重他,乐于接近这位和蔼可亲的革命前辈。”